

历史的顿挫

我们的祖先用血用泪铸就
横迈时空亘绵万里的长城
和长城般百孔千疮的历史
多少代人在痛苦和热望中
翘首未来
多少代人为自己的梦想
燃尽生命之烛
悲剧的外延早已被人类
生活的轨迹大大扩展了

顿挫：

古中国的悲剧
人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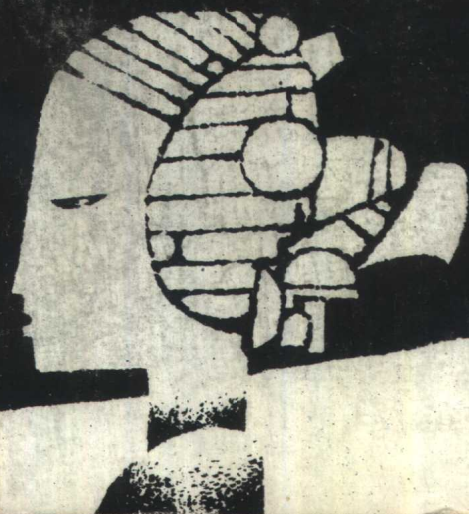
● 麋鼠怨 ● 霸王剑 ● 平均梦

● 雨霖铃 ● 浪淘沙 ● 生死路

● 男儿泪 ● 观音面 ● 少年魂

● 无定河 ● 一念误 ● 瀛台泣

● 新潮文史书系



历史的顿挫

顿挫：古中国的悲剧
人物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对于中国社会的艰难起步和前进历程，稍涉史书，便有所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过去，人们只是一味或歌颂、或唾骂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对历史事实也多是从现象来评介和理解，对“大浪淘沙”的内在原因和深刻意义，对我们民族和个人命运中一些带规律性的特质和内含，认识得往往不够自觉。在此，我们抓住“悲剧”这一旧时代最主要的表征，依人物和事件为据，择要加以研究，意在让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了解自己民族和祖先的悲剧历史和历史悲剧，鉴往以知来，加深对人生、社会和时代，对国家、民族和自身的认识。

历史的顿挫：古中国的悲剧—人物卷

责任编辑：范 炯 耿相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鹤壁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2.125印张 283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5348-0106-O/K · 20

定价4.60元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撰稿人 （依文章先后为序）

陈效鸿 颜世安 邹旭光 范振国

孙燕京 汪福宝 王界云 房鑫亮

李景屏 赵保平 徐 枫 刘永翔

万绳楠 刘子安 张 研 陈 萍

张晓虎 戴 琛 崔之清 孔祥吉

《新潮文史书系》发语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文化意识已随改革的进程，日益向深层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未来，也伸向历史，以便悉心探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内在联系，确定自己的存在方位和奋斗目标。作为出版工作者，出于对时代和社会的神圣责任，我们设计了这一带有文化特征的选题，用编辑所特有的方式，投入大时代汹涌的新潮。

我们兴奋！我们快慰！

这，是一座便桥，桥的两端是文学和历史。桥下，温热的生命之水正汨汨流过。此桥，没有草图，“匠人们”根据各自的认识、想象和审美水平营构桥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它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尝试的勇气。能否有更多的同道通过和加固这座桥呢？我们热望着。

序

昔人有言：《左传》直是一部“相斫书”；黑格尔也说，读历史有如暴风雨后纵观海上桅樯摧折的沉舟。然而，这只是消极的一面。历史毕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虽不能随心所欲，终有其向往的目标与向上、向前的进程。“矛盾引导前进”，黑格尔这句名言，可为后来马克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说作注脚。

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要因交织。想做到洞察事势，月旦人物，见微知著，真是谈何容易。无论圣·奥古斯丁以来的英雄史观，或黑格尔的理性史观，乃至马克思探物力的变革，斯潘格来倡文化的轮转，言人人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类既是社会的动物，又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在广漠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宇与宙的结合中，群策群力，力求征服自然，利用厚生，在斗争中以求生存。

中国史学，渊深源远。《春秋》的“属词比事”，《尚书》的“疏通致远”，乃至《太史公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成了治史者种种启迪。历史这一悠久荒远的过程，一治一乱，兴亡分合，总是螺旋式地上升。其间顿挫曲折，毗阴毗阳，在正反相合的历史辩证法中，奏前进的旋律，总有种种的迹象可寻。大抵开明盛世较少，而黑暗末世为多，中外皆然，无劳详举。故有人美化古代，憧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赞扬所谓的成康、文景、贞观之治，说来也不算过分。此屈原所以

“美尧舜之耿介，恶桀纣之披猖”；顾亭林《日知录》叙历代风俗，强调知耻，致慨于“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以唤起民族兴衰的责任感，决不是无病呻吟。欧阳修作《五代史》，于政俗败坏之故，每以“呜呼”两字发端，良有深意。

纵现我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就其顿挫波折、盘根错节处，选出若干段落，作触目惊心的描述，原其终始，以取教训，实为一种新的尝试。虽“纪事本末”一体，古已有之；而就有关世运的历史事件和左右局势的代表人物，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独特性格，予以集中概括，重点突出，似是历史研究中的创举。

本书诸作者，正是有意就我国历史的顿挫处，选出若干悲剧故实与悲剧人物，加以综述；并从中研讨中华民族盛衰兴亡的内在原因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民族性、社会性及其应变特点和个人色彩。可谓独具慧眼，读史得间。至其选题标准，则着重于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民族创伤感、不无悲愤遗憾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对中华民族发展起了明显的反作用并造成悲剧结果者，类皆大书特书，而出之以生动、新颖、饶有文学色彩的史论。夹叙夹议，深得太史公行文一唱三叹的笔调，真是感激豪荡，淋漓尽致，岂直“伤心人别有怀抱”而已。

抑又闻之，圆神方智，史有别裁，临文必敬，论事存恕，亦即“把一人一事置于社会和历史的纵横坐标上，确定其价值与地位”。本书诸作者深知其意，实获我心。远承孟子论世知人之训，亦符近人倡导的历史主义观点。原稿未窥全豹，偶一披寻，已有眼明手快之感，而令人兴俯仰无穷之思。因略书所感，把先睹为快的乐趣介绍给读者。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苏渊雷时年八十

目 录

廉 鼠 怨——李 斯	(1)
霸王剑——项 羽	(20)
削藩策——晁 错	(33)
战之罪——李 陵	(49)
平均梦——王 莽	(62)
渭水叹——苻 坚	(80)
雨霖铃——唐玄宗	(94)
书生志——张 巡	(112)
败亡者——唐庄宗	(127)
浪淘沙——李后主	(141)
忠缪侯——韩侂胄	(165)
生死路——文天祥	(191)
秋风祭——袁崇焕	(205)
男儿泪——史可法	(221)
少年魂——夏完淳	(239)
观音面——钱谦益	(253)
无定河——吴三桂	(272)
歧路恨——石达开	(295)
一念误——李秀成	(316)
瀛台泣——光绪帝	(339)

陈效鸿

在狱中，他上书申辩时，把自己在秦始皇生前的所作所为列为七大“罪状”（实际是七大功劳），却不包括焚书一项；至于始皇死后他的表现更只字未提。这说明，他对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不糊涂。

廪 鼠 怨

——李 斯

公元前208年冬，风雨飘摇中的秦都咸阳，气氛肃杀。市曹中央绑着一串即将处决的人犯，围观者人头攒动，窃窃私议。人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注视着中间那个满头银须、老泪横流的死囚，有的低声叹息：眼前这个咸阳城内无人不晓、多年来权倾朝野的人物，竟落得腰斩于市、夷灭三族的下场，令人实在难以置信。有的嗤之以鼻，显露出一无快意的神色，好象这个场面对他们说来早已在意料之中了。

这场悲剧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秦王朝当朝丞相李斯。在来到咸阳整整四十年之后，他以谋叛朝廷的罪人身份向这个曾与他半世功名相伴的城市告别，内心充满了愤懑和不平，然而更多的

却是遗憾、悔恨和悲哀。临刑前，李斯和他的中子洒泪诀别道：

“我多想象在你小时候那样，父子俩牵着黄狗、带着猎鹰到上蔡城东门外出打兔子啊，如今是不可能了。”常言说：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作为李斯这样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他的这些话虽算不上什么“善言”，却也吐露了几分实情，生动地道出了他四十年来政治上发迹后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失去了常人生趣的苦衷。

命运往往和人们开玩笑，你想走向一个地方，可是绕了一圈之后，却发现自己来到了相反的地方。李斯就是这样。

四十年前（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正当有为之年的李斯不过是楚国上蔡地方一介布衣之士。当时关东各国的实力已明显弱于秦国，眼看秦统一天下的趋势日益明朗，他觉得一展抱负的时机已到，于是迫不及待地告别故土，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来到秦国都城咸阳，投入丞相吕不韦门下，开始了他称之为“万乘方争”而“布衣驰鹜”的政治生涯。

此后的三十年间，李斯竭尽全力帮助秦王政创建帝业，确实干得非常得意。他不仅积极参与制定秦并六国的战略部署，而且多次提出事关全局的重要建议，对秦王的正确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旷古未有的事业中，李斯以出色的政治才干和敏锐的思想洞察力赢得了秦王本人的充分信赖，个人地位也不断上升，从一个侧身相府的舍人，经郎官而长史，而客卿，而廷尉，最后当上了位极人臣的丞相，可谓踌躇满志，功成名就。不仅如此，他的几个子女都同帝室的公主、公子联姻，全家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富贵至极。面对个人命运的这种变化，连他本人也曾感到

有点茫然失措，暗暗担心“物极则衰”，将来不好收场。

他不幸而言中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李斯对秦的统一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秦始皇死后，他为保全富贵名利而卖身投靠，帮助赵高矫诏废立在前，对胡亥曲意逢迎在后，终于导致庞大的帝国二世而亡，自己也被历史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这位开国功臣由于晚节不终而造成个人命运的悲剧，固然不足惜，可叹的是，他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乃是他自己所极力推崇的专制主义统治思想，这才是历史的悲剧。

综观李斯事秦四十年在政治舞台上升降沉浮的轨迹，不难发现，他的成功同秦国的统一事业休戚相关，而他的悲剧也和秦王朝一朝覆亡的历史形影相随。其中，李斯与秦王政（秦始皇）、韩非、赵高以及胡亥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几乎构成他后半生历史的主要线索。通过这条线索，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李斯一生在政治上的大节表现和性格特征，并进而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去认识这一人物的悲剧意义。

—

李斯入秦之前曾在楚国做过几年地方上的小吏，不甘久居人下，于是跑到荀况门下去学“帝王之术”，盼望有一天能以自己的才智学识辅佐君王成就霸业而出人头地。他说：“一个人地位卑贱而不图有所进取，那就等于禽兽只能享受到自然界现成的食物，而永远陷于穷困，这将是最大的耻辱和悲哀。长久地处于这种境地，一味埋怨世道，鄙薄功利而自己又无所作为，这绝不是士所希望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当时的秦国只从眼前

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以仁义为根本的军事扩张政策发生了兴趣，然而却被老师泼了一瓢冷水，批评他舍本求末，不懂得用仁义治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荀况综合百家之学的思想学说并不全合李斯的胃口，确切地说，李斯对于形势的观察缺乏思想家那样的理性和冷峻，更多地是基于急功近利的需要，反映出一种政客式的投机心理。他曾借“厕中鼠”和“仓中鼠”的不同遭遇（前者食不洁之物还要担惊受怕，后者吃上好粮食反而自由自在）作比喻，认为一个人最终成为贤者或是不肖之辈，完全在于“自处”，即能否把握好时机，替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因此，当他一旦认定只有秦国才具备他施展才能的条件，便毫不犹豫地辞别老师，西入咸阳，准备向秦王游说，推行自己的帝王之术。

李斯入秦那年，正好秦国庄襄王病死。即位的新君名叫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不过当时他才十三岁，因此，以“仲父”身份辅政的相国吕不韦掌握了全部军政大权。为发展秦国在兼并战争中的有利地位，吕不韦一面对关东六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一面从各国广招人材，以优厚待遇吸引大批来自不同流派的学者游士，让他们就秦统一天下的有关政治、军事等问题广泛献策，著书立说。在一段很长时期内，相府内外宾客纷至，门庭若市，最兴盛时收养“食客”竟达三千人之多。李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秦国，自然也成了吕不韦门下的舍人，不久得到吕的赏识，被荐为郎官，由此得以当面向秦王进说。

初见秦王，李斯就单刀直入，提出了抓住有利时机一举吞并六国以成帝业的主张。他认为，当年秦穆公虽建霸业，但由于列国为数众多，对周王室共同尊奉的观念尚未打破，因而不具备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自秦孝公以来六代君主所面临的局面就不同了，周王室的地位已微不足道，秦国以东广大地区只剩下六个较大的

诸侯国，而秦依靠不断的军事胜利迫使这些国家处于政治上从属的地位，就如同秦的郡县一样。对比了今昔异势之后，李斯尖锐地指出：如果错过眼下时机，让各国重新恢复力量，相互结盟，形成对秦国“合纵”的态势，到那时，“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面对少年气盛的秦王政，李斯用娓娓动听的说辞和侃侃而论的辩才阐明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的道理，赢得了对方的器重。客观地看，他的这些见解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秦国决策者面前，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胆略不失时机地把统一战争推向彻底胜利，从此结束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动乱局面。秦王非常赞同李斯的意见，于是拜他为长史，让他直接参与谋划吞并六国的具体步骤。

一开始就遇上这么个能支持自己的国君，这对李斯来说是够幸运的。为了进一步扫清统一的障碍，他又建议秦王用重金收买六国大臣，破坏其君臣团结，以干扰这些国家内外方针的制定。不久，由魏入秦的大梁人尉繚也向秦王提出类似的建议。秦王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确定由李斯负责实施。在以后的日子里，由李斯派出的一批批谋士携带大量金银珠宝来到各国，他们以秦国的武力为后盾向诸侯开展外交攻势，同时明里暗里结交亲秦势力，用丰厚的贿赂诱使他们为秦国的利益服务，对那些拒绝上钩者，或设间陷害，或使人暗杀，手段种种，无所不用其极。

反间计的实行，有力地配合了秦对六国的军事行动和“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一旦诸侯国内政局不稳，秦国马上就大兵压境，轻而易举地取得战争的胜利。齐国国王建统治后期，他的身边实际上潜藏着一个以相国后胜为首的秦国间谍网，这些人被先后

用金钱买通，不断劝诱齐王中止同别国的“合纵”，与秦交好。齐王听信其言，果然不再帮助五国攻秦，甚至长期不修攻战之备。所以，当后来秦集中力量攻灭五国之后腾出手来收拾齐国时，齐都临淄实际上已是不设防的城市，大军所到，如入无人之境。齐王建不战而降，做了战国列强中最后一个亡国之君。这是后话。

初试锋芒，李斯的政治才干得到充分的显示，秦王对他也愈加信用，不久即拜为客卿。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政，秦国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斗争。在果断镇压了嫪毐叛乱后，秦王对所有牵连此事的人作了不同处置，丞相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免。但这些并未影响秦王对李斯的基本态度，统一事业的大局把李斯的政治命运同嬴政实现“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紧紧连在了一起。秦王把他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李斯则藉此进入了秦王的核心统治集团。

可是，正当李斯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拴在秦王统一六国的战车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另一件看似偶然的事却差一点断送了李斯的前程，这就是韩人郑国提出修筑水渠计划一事。说来事巧，郑国本是水利工程专家，他来到秦国游说，以帮助发展关中农业为由向秦王建议开凿一条引泾水入洛、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郑国的本意是投秦王所好，唆使其大兴工程，消耗国力，以减轻秦对韩国的军事压力。秦王起初并未察觉，但工程开始后却在秦国宗室集团内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宗室大臣本来就对外来客卿心怀不满，现在正好抓住开渠对秦国眼前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做文章，纷纷跑到秦王面前攻击所有来秦的各国游说者，说这些人无非是替本国君主效劳，到秦国来从事间谍破坏活动，要求把他们一律赶走。经这么一提醒，秦王果然由警觉而反感，不但把郑国抓了起来，而且进一步迁怒于所有客卿。出于维护统一事业大局的动

机，他下令驱逐在秦任职的全部外来游士。这是公元前237年发生的事。

事态的这一突变，对于李斯无异于当头一棒。然而沮丧之余，他并不甘心就此沦为“厠中鼠”那样的不肖之辈。为了挽回即将失去的一切，李斯决心与命运抗争，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秦王改变主意——对此，他是有相当把握的，因为他确信秦王政的事业离不开自己。于是，一份情恳辞切的《谏逐客书》就在李斯离开咸阳上路的同时递到了秦王的案前。

在上书中，李斯首先用事实证明客卿在秦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如果当初穆公、孝公、惠王、昭王拒绝接纳愿为秦国效劳的四方宾客，不让对国家有用的人材充分施展才能，国家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强盛的局面。接着，话锋一转，批评秦王对于秦国以外的珍宝、良马、音乐、美女等都能广泛采纳，为我所用，可偏偏对于人材却要“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认为这绝不是用以统一天下的办法。李斯用“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说明欲无敌于天下，必须使拥护自己的人愈多愈好，“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而现在秦王逐客令一下，就等于丢弃人民以帮助敌人，拒绝宾客以充实各国，并使天下的人材再也不敢到秦国来。上书的最后，以激烈的措词提出警告说，这种把四方宾客推向敌国的做法损害本国人民利益而对仇人有利，必将造成国力空虚，四面树敌的严重后果，到那时，秦国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进行这样的直言进谏，于李斯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书中驳议逐客一事，剖析之深刻，语气之中肯，陈辞之慷慨，却不能不使秦王受到很大震动，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于是，他立即收

回成命，同时派专人一直追到骊邑，把李斯请回咸阳，官复原职。这份《谏逐客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使秦王在政治决策上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严重恶果、影响深远的重大失误，而且也最终奠定了李斯在秦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逐客事件的戏剧性变化，与其看作是李斯同命运顽强抗争的结果，还不如归之于他对现实生活中即将到来的帝王富贵之业的一往情深。以此为契机，李斯与秦王政在政治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不久即被擢升为廷尉。从此，李斯更加自觉地将谄熟已久的法家治国之道运用于政治斗争的实践，成为秦王政在实行专制主义统治时所十分倚重的股肱之臣。

二

当初，与李斯一起从荀况学“帝王之术”的还有一位后来成为战国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他的思想对李斯以至秦王政本人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四年），正当秦王依照李斯的谋划把韩国作为统一战争的首攻目标时，韩非以韩国公子的身份来到秦国，意在说服秦王暂时放弃灭韩的打算。于是，在各为其主的两位老同学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斗争。

和李斯不同，韩非出身于宗室贵族，对于韩国在兼并战争中面临强秦威胁而处于极端险恶的境地怀着深切的忧虑，因此他的法治抱负同爱国立场往往是一致的。他曾多次向韩王安提出过变法图强的建议，均遭到拒绝，于是只好通过发愤著书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宣传以法治国的主张。这些书很快流传到了秦国，秦王政读了其中的《孤愤》、《五蠹》等篇后不禁大为倾倒，表示自己